

接看作是社会消费。这是不科学的。这实质上否定了这类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作用。例如国防支出,可以分为官兵的给养支出,部队的装备支出等。这方面的资源占用及耗用并不是公共消费,而是为了“生产”出“安全安定”这种公共消费品。显然,真正属于公共消费的是“安全安定”而不是国防费用本身,国防费开支无疑属于资源配置。更何况,把用于士兵个人消费的给养看作是公共消费,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其他所有上述“非生产性开支”都有类似的性质。

(摘自《财贸经济》1993年第5期,作者:吴俊培)

## 内地应在吸引外资 开发重工业方面 走出新路

《学习·研究·参考》今年第6期发表方觉同志文章,提出内地的对外开放要因地制宜,应在吸引外资开发重工业方面走出新路。作者认为:内地要实现外商工业投资结构合理,必须克服“重工业无前途”的片面观点。这些年来内地重工业面临着更新技术、调整结构、转换机制、提高效益的重重困难。与此相对照,沿海地区的轻加工业,往往盈利大、回收快、销路好。于是内地一些同志急欲起而效法。对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外商投资的轻加工业,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目前不少方面(如纺织品、玩具、工艺品等)已出现相当程度的饱和。对外开放起步较晚的内地要

花费主要力量在这方面参加竞争,恐怕会事倍功半。内地应把吸引外商投资轻加工业掌握在合理的限度内。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为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比较发达的重工业基础,才能够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与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即使像韩国、台湾这类中小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八十年代以来重化工业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此,内地如果在吸引外商投资开发重工业方面走出新路,将会及时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物质技术要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头羊。

(莹摘)

## 当务之急是严格控制 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瞭望》1993年第23期发表文章认为,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几次出现的大起大落,都同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有直接关系。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当务之急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管好货币和信贷的总闸门。对于新批准和新开工的项目,除计划内的重点项目外,要从严控制;对于在建项目,要根据财力和物力的可能,确保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要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对房地产投资的宏观协调和规范化管埋;要下大力气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坚持“择优扶植”的原则,确保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产品有销路、经济效益好、发展有后劲的国有企业所需资金;要坚决制止乱拆借、乱集资的行为,使用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规范金融秩序,净化经济环境,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安摘)

## 并非一讲国家集中 就是对企业的“卡紧”

等价交换,是市场活动的规则,它反映了企业之间的平等关系,因而应当成为国家所概括和维护的一个共同规则。一旦形成了真正遵循等价交换规则的市场秩序,自主经营的企业就会在这种秩序或态势的制约下,对自己的经营状况承担责任,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促使生产和需求及时协调,求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把企业推向市场,就是要把企业推进国家所维持的遵循等价交换、平等竞争规则的市场秩序之中。既要搞活企业,又要防止失控,这有难度。如果国家能够造就出良好的市场秩序,并且使企业置身于其中,就能够使企业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有效地进行自我约束。在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许多企业将会“搞活”,也有的企业可能会“搞死”,但只要没有“搞乱”,则就是正常的。由于企业所必需遵循的等价交换规则的秩序,要通过国家的概括或集中才能形成,所以,并非一讲国家集中,就是对企业“卡紧”。应当说,国家所实施的正确的集中,有助于企业放开手脚,到市场上去竞争和发展,而这又正意味着“放松”。如果国家不能培育出规则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就无法使市场替代国家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调节者。

(摘自《求是》1993年第11期)